

## 从去蔽到控制 ——对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思考

申 锋, 薛健飞

**摘 要:** 科学技术从作为正面的、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到成为人们加以批判的“意识形态”这一转变, 是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科学技术在发挥祛除蒙昧作用的同时, 越来越具有控制作用, 逐渐成为新的统治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给予我们很大的启迪。由于受到儒家道德哲学的影响以及讲求整体、辩证综合、直观顿悟等传统思维方式的浸染, 中国需要在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保持警惕的前提下, 积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加快自身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 转变; 应对

**作者简介:** 申锋, 常州大学党委办公室讲师; 薛健飞, 常州大学党委办公室副研究员,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网络文化安全体系构建研究”(16YJCZH130);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网络谣言叙事中的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研究”(17MLC004); 常州大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一般课题“日常生活视域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16LLSJ20)。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8.05.011

当法国人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首次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时候, 他应该不会想到,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后面会经历如此曲折的变化发展。同样的, 当马克思从否定性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 他应该也没有想到, 自己一直视作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革命性力量作用的科学技术, 后来竟然幻化成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 成为当前众多学者讨论的热点。“意识形态”概念自产生之日起,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后,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哈贝马斯沿着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思路, 结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现状, 揭示出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特征, 成为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 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 成为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然而,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 科学技术何以成为意识形态? 它与传统意识形态有什么不同? 面对这一由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概念, 我们该如何应对? 针对这些追问, 我们需要运用历史的眼光加以分析, 既要看到科学技术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也要看到科学技术给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所需破解的是, 如何让科学技术在“去蔽”的道路上顺利前行, 避免被科学技术所“控制”, 从而克服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 引导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

## 一、科学技术何以成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属于一个现代概念，它在产生之初是以正面意义示人的。特拉西就是为了使自己与传统的观念划清界限，才在寻找真正的知识基础过程中创立意识形态概念的。他在批判宗教意识（如“天启”观念、迷信意识）和形而上学（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的知识时，认为这些权威的观念是不能还原为人们的直接感觉的，而创立意识形态，就是对一切观念知识进行感觉经验的检验，从而为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建立真正的理论基础。所以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深刻地剖析道：“意识形态属于现代，属于勇敢的世俗和科学理性的新时代。它的目的是把人们从神秘迷信和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对上帝、贵族和专制君主的虚伪崇敬中解放出来，恢复作为充分理性的、自我决定的存在所应有的尊严。它是精神层面上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sup>[1]</sup>意识形态在创始之初，作为资产阶级的“精神层面的革命”，具有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的积极意义；而科学与技术，在欧洲封建政权体制和社会结构行将崩溃的时候，也是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借以批判、摧毁旧的统治阶级地位的有效武器。资产阶级社会将科学技术的唯理论基础加以利用，不断在“合理的”基础上积极改变人类的思维，将人从带着传统、旧习惯和禁忌烙印的大量规范和戒律中解放出来，从而进一步完成资产阶级新的政治体制的合法化和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化<sup>[2]</sup>。

当意识形态概念从法国传入德国，被马克思所掌握后，意识形态原来的本质就发生了否定性的改变。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把意识形态看作异化了的产物。他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深入批判，从而创立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进一步认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编造幻想、掩蔽现实、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精神力量，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虚幻性、掩蔽性。虽然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有时会作为中性的概念出现，但总体上来看，马克思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他对意识形态企图遮蔽经济与社会真正本质的种种虚假话语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无情揭露，这种批判成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也对后世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性质的这一批判性的改变，彻底激发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活力，拓展了意识形态批判功能的边界，而这也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纳入意识形态讨论范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然而，我们发现，正如文章开篇所言，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科学技术一直被认为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革命性力量的作用，进而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3]</sup>可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在工业生产领域的应用，一些重要的科技发明（如蒸汽磨）的产生，是对旧的生产力（如手推磨）的革命，这种新科学技术往往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也成为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也敏锐地发现了机器的使用会造成工人的肉体与精神上的损害，但总的来看，科学技术仍是消除愚昧无知的有效手段，是对统治阶级“虚假性”意识形态迷雾的积极应对。

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科学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作用愈益明显，与传统相比，此时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对十九世纪末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这种转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纪念 H. 马尔库塞诞辰七十周年》一文中有明确论述。他说：“自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sup>[4]58</sup>，“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趋势日益明显。……当技术的发展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产生了反馈作用时，情况就起了变化。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sup>[4]62</sup>。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科技理性、科学技术的活动方法得以成为人类其他活动的尺度，科学技术已经不是单纯的生产手段，而是在观念上逐渐转变为科学技术对一切的控制。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已经由政治、经济上的统治转变为技术性的统治，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更具欺骗性、更具控制性、更具维护功能、更难以消除的新的意识形态。

由上面论述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经历了一个“肯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否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科学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圆圈式转变”<sup>[5]</sup>。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这一历史转变，使得意识形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要求我们不能再以真假来对意识形态进行定性，或者说，在当下，我们讨论意识形态的重点不能仅仅放在其虚假性上，因为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已不再是虚假意识，不再像传统意识形态那样诉诸于让人迷狂的神秘主义和神话奇迹，而是能够反映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因此，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跳出意识形态被定性为“虚假性”的小圈子，从更为宽广、更深层次的角度来探讨意识形态。讨论意识形态是否“虚假”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而讨论意识形态如何统治人、支配人、控制人才更具有实在意义。正如俞吾金教授所说的那样：“即使是正确的认识或观念，当它被确立为绝对的权威，当它成为一种统治形式，或当它超出自己原本适用的范围被使用时，也完全可能被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性质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重要的不再在于：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而是在于：它是统治人、支配人的观念性的力量，还是解放人、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精神性的力量。”<sup>[6]</sup>

## 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

最先把意识形态批判指向科学技术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科学技术在没有羽翼丰满的时候，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多为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宗教的等诸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活动。在这个时候，科学技术扮演着为人类寻找自然界真理的角色。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就是打着反对愚昧、专治和黑暗，追求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民主的旗号开展的，对科学与理性的尊崇也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基本基调。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sup>[7]</sup>霍克海默却对资产阶级引以为傲的启蒙运动进行了无穷的批判，他认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sup>[8]1</sup>。被视为启蒙运动之“神”的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了改造自然的知识，使人们摆脱了未知的恐惧与自然力的控制，但是启蒙自身却又变成了一种新的统治和奴役，又成为人奴役自然和人自我奴役的新的“神”和“独裁者”。“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sup>[8]6</sup>霍克海默在其《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用辛辣的笔触详细地分析了启蒙精神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中发挥着它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文化工业的代表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通过将人们的消费“图式化”，掠夺了个人的审美功能和批判功能，同时通过提供充分的娱乐产品，满足人们闲暇时的消遣，却阻碍人

们寻找自身真正的需要，消除人们的反抗意识<sup>[8]107-152</sup>。

马尔库塞延续了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路。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一切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发生的反对或抗议，压制了人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窒息了人们要求自由的需要，从而造就了“单向度的人”。但是与以往不同，造成这种极权主义社会的原因不是暴力和恐怖，恰恰是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强化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同时还扩大到了所有的领域。由此，科学技术不再是中立的，而具有维护政治统治的功能，为现存社会的合法性加以辩护，从而由“解放的力量”转为“解放的桎梏”。“技术还为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强大的合理性，并说明了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生活舒适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机构的屈从。……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人的工具化。”<sup>[9]</sup>

哈贝马斯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他认为，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科学与技术还没有充分发展，科技理性还不足以抗衡传统社会，传统社会依然是依靠自上而下的、由统治阶级所赋予的具有神圣化、宗教化的合法性来进行统治的。无论是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天赋人权”观念，还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都被蒙上了普世性的虚假外衣，也呈现出表面上的合法性。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强调的自由交换发生失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使得“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普世性被无情揭穿，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开始出现危机，“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假象被戳穿，统治与奴役的权力被裸露出来，这些因素意味着资本主义面临合法性的危机，资产阶级必须寻找新的政治出路”<sup>[10]</sup>。面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要想维持统治，就要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缓和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无序状态。资本主义的这种干预，与其原来所鼓吹的普世性口号必然产生矛盾，从而引起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因而，资产阶级还要通过一定的补偿手段，来确保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与忠诚。而这种补偿手段，在资产阶级看来，最有效的就是通过发展科学与技术相对增加人们的财富。因此，科学与技术被高度重视，特别是现代技术与科学、工业研究和工业利用紧密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成为维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成为决定社会系统发展的一种自主性力量，最终成为了“第一生产力”。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所说的“科学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已经与马克思的论述有了明显区别：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技术蕴含着巨大的具有革命性、解放性的潜力，到了哈贝马斯这里，科学技术反而成为了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蜕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说：“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sup>[4]69</sup>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并没有施展什么迷惑人的手段，而是切切实实带给人以利益，因此，它的“意识形态性较少”；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所提倡的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富裕使得人们丧失了批判的欲望，从而使得科学技术成为唯一的准则，又陷入到另外一个极端中去，使得在生活世界中，人们习惯于服从以“经济和效率的名义压制了所有的选择，只允许对从属于一个既定目的的不同方式展开争论”。<sup>[11]</sup>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技术以其“客观性”和“有效性”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的“祛魅”,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起合法性的地位,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异化问题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消解,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的支配与控制。科学技术经历了由祛除蒙昧、反抗封建社会统治的“天使”,到控制、操纵、压制人类,使人变成“单面人”的“魔鬼”的转变,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正是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过程中被深刻揭露的。再加上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元分立的观念,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决策的正确、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先决性、社会生活组织的理性化等,这些观念与科学技术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二者的结合,使得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强大的统治系统:人们在掌握科学技术的同时,却越来越被宰制和操控、被压抑和限制,从而丧失了追求全面解放的信仰和能力,科学技术带来的现代工业文明涤荡了神圣和崇高,自身又陷入了工具理性的牢笼之中。科学与技术导致了一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的“宿命”,即理性与知识“合谋”后形成了对人的绝对控制,“人的自由成为一种虚假的自由,沦为只有在占有、消费中才能感知自己存在,成为异化了的的存在者,成为沉默、无言的存在者,失去了人之所是”<sup>[12]</sup>。

### 三、中国语境下应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的发展长期处于先进水平,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对科技发明家的尊崇也是处于非常高的程度。先秦时期《考工记》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sup>[13]363</sup> 中国人认为,能够运用其所知而有所“创物”的都是圣人,如后人耳熟能详的“燧人出火”“伏羲氏作瑟”“神农和药济人”“黄帝见百物始穿井”“隶首作算数”“容成造历”“女媧作笙簧”“巫咸初作医”“舜始陶”“鲧作城郭”“禹作宫室”“奚仲作车”“宿沙作煮盐”“公输作石碣”等。这些圣人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发明都受到历代人的崇敬与膜拜。但是随着后来对“道”“器”的明确区分,使得对“器”的重视程度开始降低。例如,《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君子不器。”<sup>[14]17</sup> 这就明显含有对器物层面的轻视。孔子认为,具体的技艺虽然有可取之处,但君子不能像器皿那样仅仅满足于小术,而应该追求大道,如果长时间沉浸在“器”的层面,就会有损于大道的获得。正如《论语·子张》所说:“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sup>[14]198</sup> 同样,在庄子那里,“技”也被视作次要的东西,甚至是可能会败坏人心、扰乱心神的“机心”,而“机心”则会让人心地不纯,精神漂浮不定,没有操守而不能得道。例如,在《庄子·天地》有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sup>[15]</sup> 因此,在长久以来的封建社会,中国哲学上的“道器之辩”是“道进乎技”的,对形而上的“道”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形而下的“器”。直到明清之际,“器”又受到重视。例如,顾炎武主张“先器识,后文艺”的观点,指出“士当以器识为先”<sup>[13]218</sup> (《日知录·文人之多》);施闰章提出“道以器行”<sup>[13]218</sup> (《青原毗卢阁记》);而王夫之更是主张“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sup>[13]219</sup> (《周易外传》)。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呐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激荡起一道新的思想浪花,但是这道浪花也只是转瞬即逝,没有形成大的影响。到了清代,更为严重的文化专制主义阻碍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受到禁锢。到了晚清,洋务派终于开始倡导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各种顽固派守旧势力以“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标榜自己为儒家正统思想的传承者,他们为反对科学技术引入中国寻找各种理论依据,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斥为“奇技淫巧”而竭力贬低,而洋务运动也面临着百般阻

挠与各种反对的声音,最终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总体来看,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学兴起,到汉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和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儒学,这个漫长的时间正是“以儒为宗”的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不断得到强化、巩固的历史,是儒学由边缘走向政治统治中心地位的历史<sup>[16]</sup>。中国历史由于长期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自上而下弥漫着儒家尊崇“道统”的观念,鄙视和摒弃重“器”的观念。儒家文化精心构建的以仁为本的道德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稳定,保证社会的基本安定,促进家庭的伦理和谐。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智识、智思,都是以服务于儒家道统为目的。欲成仁者,必具智思;智必服从于仁,智是仁的辅助手段。这是儒家仁本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但是,这种道德哲学以伦理中心主义维护其等级森严的制度,严重阻碍了自然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致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落伍。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本身缺乏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良好“基因”,产生不了“内生性”的近代科学技术,在学习外来近代科学技术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排异”反应<sup>[17]</sup>,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接纳、包容新的思想。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科玄论战”之后,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为代表,才真正宣布将“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在中国大地上竖立起来,并誓死加以捍卫、宣扬、散播。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的那样:“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sup>[18]</sup>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中国对科学技术的重新重视,至今不过百年时间,而早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前三百年的英国,实验科学鼻祖弗朗西斯·培根就提出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当代中国在吸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学习现代科学精神上存在着一个历史的“时间差”,“当我们在努力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西方已出现了现代性危机;当我们大力发展科技时,西方科技已成为了意识形态”<sup>[19]</sup>。可见,由于历史的不同,科学技术的观念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科学与技术在中国的运用范围以及整体科技水平仍旧处于需要不断发展的阶段,此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科学与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论述并不能适应于中国国情。

从思维方式来看,科学与技术背后所赖以立足的理性精神与理性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讲求整体动态、辩证综合与直观顿悟,强调“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sup>[20]</sup>。这种传统的思维方法,非理性思维方式占有主要部分,有着强调整体性、追求天人合一的特点,在涵养性情、提升伦理德行的自我修为上具有优势,但其缺陷是缺乏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和严谨、致密的理性分析方法,而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和严谨、致密的理性分析方法正是发展科学技术所需要的思维前提和观念保障。“尽管理性在认识世界时也会出错,但从最终意义上看它还是可以把握包括非理性因素在内的世界一切事物性质的”,“我们才认为理性更根本一些”<sup>[21]</sup>。因此,对传统非理性思维方式根基深厚、氛围浓厚的中国而言,过分强调科学与技术的消极作用显然不合时宜,中国当下更需要的是改变传统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学习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加快自身现代化进程。但是我们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西方诸学者对科学技术所引起的人的物化的批判,以及过度强调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多重危机,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结合时代精神,结合中国客观实际,通过对现代化理念进行批判反思,确立起对科学技术的合理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健康前行。

## 参考文献:

- [1] 特里·伊格尔顿.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M]. 马海良,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80.
- [2] 卡拉-姆尔扎.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形成 [J]. 丁凡, 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92 (2): 29-30.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42.
- [4] 尤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 李黎, 郭官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5] 俞吾金. 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到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 (3): 14-17.
- [6]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 [M]. 修订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86-387.
- [7] 威尔·杜兰特. 世界文明史: 宗教改革 [M]. 台湾幼狮文化,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948.
- [8]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9]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 刘继, 译. 11版.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134-135.
- [10] 戈士国. 统治与操控的合理化机制——“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文本学解读 [J]. 哲学研究, 2012 (5): 93-98.
- [11] 大卫·麦克里兰. 意识形态 [M]. 孔兆政, 蒋龙翔, 译. 2版.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100.
- [12] 常新. 被遮蔽了的人的存在——从神学与科学对人的主体“身份”确认谈起 [J]. 学术界, 2018 (4): 132-140.
- [13]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辞典 [M]. 修订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 [14]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3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5]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344.
- [16] 王永贵. 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 [J]. 学海, 2017 (6): 5-11.
- [17] 董贵成. 中国传统观念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排异”反应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1 (5): 18-21.
- [18] 陈独秀.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EB/OL]. (2009-05-01) [2018-03-20]. [http://book.ifeng.com/special/wusiwenrenpu/list/200905/0501\\_6351\\_1135146.shtml](http://book.ifeng.com/special/wusiwenrenpu/list/200905/0501_6351_1135146.shtml).
- [19] 刘英杰.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32.
- [20] 张岱年, 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 [M]. 修订版.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59.
- [21] 杨生平. 作为理性对立面的意识形态——乔治·拉伦意识形态观评析 [J]. 江海学刊, 2018 (1): 46-53.

## From Aletheuein to Control: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Ideology

Shen Feng, Xue Jianfei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a positive and important force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to an “ideology” that people criticize is the result of people’s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under diffe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le removing ignorance,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controlling role and gradually becomes the new ruling power.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has provided us with great inspiratio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traditional modes of thinking such as holistic approach, dialectical synthesis and intuitive epiphany,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needs to be accelerated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be vigilant against the ideological na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ide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form; respond

(收稿日期: 2018-05-18; 责任编辑: 陈鸿)